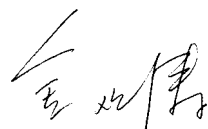


我們生活在「新世紀」嗎？



時間是連續的，但人類對世紀的意識絕不是連續的。某些重大的歷史事件造成社會普遍觀念的巨變，使我們把這一個世紀和上一個世紀區別開來。從這個意義上講，今天的人類意識還停留在二十世紀。但那遲早將帶我們進入新世紀的重大事件究竟會是甚麼呢？

甚麼是「世紀意識」？

每當寫信或填日期，我就有一種充滿矛盾的怪異感覺。筆下的2000年，明確告訴我們已生活在二十一世紀，但無論是對周圍世界的印象，還是社會思想形態，和上個世紀90年代並沒有甚麼兩樣。事實上，由於生活的連續性，我們日常的時間意識也是連續的，但世紀意識卻不是這樣。當我們一想到十九世紀時，往往感到它十分遙遠，與二十世紀那種現代感完全不同。這種世紀意識不連續的飛躍，究竟是如何造成的呢？

通常人們把它歸為科技進步以及經濟發展所導致的世界面貌之巨變。但只要把這種觀點放到歷史上去檢驗，就會發現其站不住腳。例如，辛亥革命前十年是中國社會第一次現代化高潮，中國很多現代城市都是在那一段時間興起，而且其面貌一直保持到50年代。正是在那一段時間，推行新政和立憲的清政府力圖樣樣與世界接軌，社會經濟和科技進步迅速。物質放射性的發現、飛機升空都是劃時代的科技事件，當時中國知識份子不僅在雜誌上立即介紹鐳錠原理，甚至自行製造飛機參與飛行實驗。但是縱然如此，今天的中國人一談起辛亥革命前的社會，仍將其視為十九世紀的延續。如果我



們翻閱1905年至1911年間的《東方雜誌》，就可以證實這種印象。無論是雜誌上刊登的那些今天已被遺忘的皇宮貴族和儒臣照片，還是當時通行的政治話語，都屬於十九世紀。中國的二十世紀意識實際上發端於1914年以後，一次世界大戰不僅改變了中國人對西方十九世紀式的觀念，隨即興起的新文化運動更是奠定了二十世紀思想的基本形態。

用一次大戰爆發來區分十九世紀和二十世紀意識，不僅適用於中國，也適用於西方世界。湯因比 (Arnold J. Toynbee) 曾這樣形容一次大戰給他的震撼：「我一直沉迷在一種幻覺裏，以為我將會在一個理性的、秩序的、和平的世界裏，渡過我的終生。直到1914年8月，我26歲那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令我突然覺醒過來，開始理解到事實的真相，……覺得目前令我震驚的事，早在西元前五世紀的希臘史學家修西底斯特，已經有同樣的經歷。」湯因比所講的那個幻覺，正是十九世紀英國維多利亞時代。湯因比將偉大的維多利亞時代終結與古希臘羅馬文明衰落相比擬，決心用《歷史研究》來揭示西方文明衰落之謎，其背後的精神動力正是二十世紀對十九世紀意識的取代。

眾所周知，正是一次大戰帶來了西方世界翻天覆地的變化。大英帝國從此衰落，美國成為資本主義中心。歐洲法西斯主義盛行，而世界大戰觸發的十月革命，更使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追求成為世界性的運動。西方殖民主義體系的解體和社會主義實踐及其失敗，構成了和十九世紀意識完全不同的二十世紀意識。

十九世紀意識從哪裏來：從啟蒙到經濟自由主義

這樣看來，所謂世紀意識似乎來自於那些重大歷史事件對人類普遍觀念的震撼。時間雖是連續的，但由人類經驗整合起來的觀念世界並不連續。當重大的社會事變引起新的觀念世界取代舊的觀念世界時，也就形成了新的世紀意識，那麼，是否可以用這一推斷，去說明十九世紀意識的形成呢？

其實，一戰前湯因比稱之為那個「理性、秩序、和平世界」，不僅僅是十九世紀末和二十世紀初的社會面貌，它在某種程度上十分典型地代表了十九世紀西方人的世紀意識。經濟學家凱恩斯 (John Maynard Keynes) 曾十分傳神地描寫過一戰前西方人的心態：「倫敦的居民可以用電話訂貨，在牀上啜早茶，他也可以買到世界上的各種產品，而且會如他所要求的數量，他也可以要求貨物送到門口，……他也可以不經過辦理護照或其他手續，用廉宜的交通方法去任何國家或任何氣候區，……更重要的，是他認為這種情況是正常的、確定的和經常的，任何與此種慣常的情況不符狀態是反常的、不正當的、可以避免的。」上述描寫很容易使人想到今天的香港。而與其相應心態的形成暗含着兩個前提：一，和平環境下現代經濟長時間高速增長，工業社會大多數人生活得到改善；二，隨着現代經濟向全球擴張，自由主義信念也隨之普及。西方人上述十九世

紀意識的形成背後，似乎找不到類似於一次世界大戰那樣震撼全球的事件。這種以經濟自由主義為特徵的十九世紀意識又是如何出現的呢？

博蘭尼 (Karl Polanyi) 曾考察過經濟自由主義的起源。它緣於1815年拿破崙在滑鐵盧戰敗後歐洲大致安定和平的環境，博蘭尼將其稱為「百年和平」。正是在這百年和平時期，歐洲一躍成為全球現代化的火車頭，也是經濟最發達的地區。而經濟自由主義並不是現代市場經濟成長之自發結果，相反，勞動力市場和自由放任倒是在政治和意識形態干預下形成的。博蘭尼詳盡地描繪了自十九世紀開始，市場機制如何被人們視為如同物理、生物世界那種自然規律，以及在這種觀念指導下自由放任主義如何出現。也就是說，經濟自由主義並非市場經濟發展自發的結果，而是來自於啟蒙時代建立的普遍觀念之展開和它所帶來的震撼。確實，如果我們越過「百年和平」和自由主義意識形態的實踐，再往前追溯，則可以發現十八世紀波瀾壯闊的啟蒙運動和震撼人類靈魂的大事件，這就是法國大革命。法國大革命作為啟蒙運動積累的社會動力的總爆發，發生在十八世紀末。它對社會的震撼平靜下來後，對革命之恐懼和相對保守的年代隨即來臨。正是在這一時期自由成為現代價值的基本形態，開創了人類十九世紀的意識。

現代性兩種形態的交替

由上述回顧可以看到，左右人類的「世紀意識」的較為深層因素，是同人們對現代性的看法有關。所謂現代性，是肯定個人自主性，並把社會看作由自主個人構成。個人自主性起源於十七世紀，十八世紀成為啟蒙運動的基本價值，並同傳統社會秩序發生了廣泛的衝突。在啟蒙運動中，自由和平等同時包含在個人自主性之中，它們並不是互相矛盾的。但在繼法國革命後那個相對保守的年代，個人權利和自由成為自主性認識的主要內涵，經濟自由主義從現代性中凸現出來，構成了支配整個十九世紀的「世紀意識」。然而，由於這種現代性內在的缺陷，它不得不面臨被自身的實踐所破壞的命運。自由放任的經濟造成越來越嚴重的貧富差距，對於無產者來說，個人自主完全是一句空話。將個人爭權利放大到國家層面，就是民族國家的形成和競爭，正是這種競爭導致了世界大戰。一次大戰作為破壞自由主義和百年和平的象徵，完全改變了人們對現代性的認識。追求平等的道德熱忱從個人自主性中脫胎而出，成為二十世紀意識的核心。在西方它是福利國家和種種社會主義思潮的動力，而在全世界它構成了波瀾壯闊的民族解放與共產主義革命運動。

總之，正因為現代性之展開，以及它造成的社會危機迫使人們對現代性的再認識，恰好是以百年為時間單位的。它具有與世紀變遷某種同步性，這也造就了人類對近現代社會變遷過程中不連續的「世紀意識」。根據上述分析，我們自然可以問：在二十一世紀，人們會有一種全新的「世紀意識」嗎？如果仍以對

現代性認識之改變作為「世紀意識」的尺度，那麼二十世紀極權主義的衰落和1989年全球範圍社會主義實踐的失敗，就已經宣告了以道德烏托邦為現代性價值存在着巨大問題，人類對現代性的看法已再次發生了巨變。福山 (Francis Fukuyama) 的「歷史終結」論，亨廷頓 (Samuel P. Huntington) 的「文明衝突」論，都是在這一背景下提出的。從這個意義上講，我們早在1990年代已提前進入了「二十一世紀意識」。「二十一世紀意識」似乎與「十九世紀意識」和「二十世紀意識」不同，它是走在時間前面的。

如果我們不是以回歸自由主義為標準，而是以更多廣闊的視野去探討現代性，問題就不同了。例如後現代的種種解構是否正導致公共性喪失？以及急驟擴張的互聯網，是否會改變個人與個人之間的關係，從而使個人自主性產生一種新的畸變？這一切使得未來的個人自主性不可能為自由主義涵蓋，甚至可能顛覆自由主義的基本價值，或出現一種歷史上未曾知曉有關個人自主性的新形態。這一巨變發生在何時？將以何種方式展現？這是我們目前難以估計的。但是至少以目前中國的情況而論，對平等的漠視以及日益對立的爭論似乎已顯示90年代建立起來的現代性認識存在着種種問題。以某種重大事件顯現的現代性之危機似乎是難以避免的，它的來臨才會使我們真正生活在一個新世紀。

金觀濤 香港中文大學當代中國文化研究中心主任

「公共空間」與「公共財」



如果要在價值多元、利益衝突的渾沌之中不是通過支配而是通過協調來逐步形成秩序和規範，那麼只有通過公共空間才能創造出超越自我、超越功利、超越當下的「國內公共財」和「國際公共財」。但是，該公共空間不僅包括國家的公共性，而且還包括社會的公共性，能卓然獨立於行政權力的「公論」比流行一時的「輿論」應該得到更多的強調。